

第三章

勞動教養

勞動教養，簡稱「勞教」。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握政權後的「新生事物」，不像「判刑勞改」那樣，有一段悠久歷史。勞動教養是中共在「治安管理處罰和法院判刑之間創建了一個層次……形成了一個輕重銜接，嚴密合理的三級裁判體系……（勞動教養）可以避免複雜的訴訟程序……收到迅速維護社會治安的功效」^①。勞動教養是中共「兩勞工作」之一，中共官方宣稱勞動教養的特徵如下：

1. 勞動教養是對違法犯罪輕微，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2. 勞動教養沒有法律訴訟程序，只需由公安，司法，民政，勞動人事部門組成的，設置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及批准即可。

3. 被勞動教養的人送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大中城市設置的勞動教養所服勞教期。

4. 勞動教養不是「剝奪自由」，是「限制自由」，而且沒有剝奪政治權利。

5. 對勞動教養的人，稱爲「人員」，不稱犯人，「按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原則實行嚴格管理」。

勞動教養「人員」，有「適當工資」，「表現良好的，經勞教所批准，可以在勞教期間請假回家探親」。

6. 勞動教養最高期限爲三年。

7. 勞動教養期滿，表現不好，可以延長勞教期。勞教期滿，可以強制留場就業。

勞動教養政策實施於一九五七年，由於中共刻意將勞動教養政策掩飾在「人民內部矛盾」和「最高行政處分」的範疇內，以致外界對之缺乏了解或產生誤解，以爲勞動教養是社會教育性質

的行政法規。其實，勞動教養政策在中共專制統治機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節 實施勞動教養的歷史背景及其理論根據

一、歷史背景

一九五七年是中共政權發展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至一九五七年共約八年時間。在這八年中，中共政權通過「土地改革」、「剿匪反霸」②、「鎮壓反革命」③、「三反，五反」④、「農業合作化」⑤、「公私合營」⑥等政治運動，基本上摧毀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各地方割據勢力的政治力量及影響。地主及資產階級的政治及經濟力量亦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這些政治運動依照馬克思，列寧及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用「群眾鬥爭」方式，即革命的紅色恐怖手段，使大約二千萬人從中國社會上消失了。接著，中共又在一九五五年發動「肅清反革命運動」⑦，運動的目的正如毛澤東說的：「因為在革命大風暴時期，我們是勝利者，各種人都向我們靠攏，未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作一次徹底的清理。」（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月）。通過「肅反運動」，中共的統治秩序穩固地全面地建立起來了。

一九五二年朝鮮戰爭結束，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特別在一九五六年，一度呈現了相當良好的發展趨勢，社會秩序相對穩定，文化知識界亦相當活躍與繁榮，然而，農民才得到的土地被「農業合作化運動」奪走，成了農村中低價的農奴性的勞動者，工人們並沒有得到多少政治和經濟利益，而受制於較資本家更為嚴酷的共產黨幹部。知識分子被排斥，被列為需要「改造」的地位。總之，中國人民期望的和平、民主、自由、統一、繁榮的社會主義並沒有出現。同時，龐大的共產黨官僚統治階級形成了。這個統治階級不僅要維持已得的利益和權力，而且，貪婪地利用絕對控制的國家機器，攫取更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它的殘暴和腐敗本質不可避免地被人們逐漸認清，繼而不滿和反抗開始滋長蔓延。

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已被摧毀，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遭到了整肅，他們的子女都處在「另冊」^⑧之中。他們過著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在接二連三來到的政治運動中，要不斷地表示自己與剝削家庭劃清界限，無盡無休地批判自己的階級出身和反動思想，虔誠地要求艱苦改造，表示永遠聽從「黨和毛主席的教導」，以求生存，但是，整個社會的不滿和反抗並未減少，而且愈來愈多的反抗和不滿來自工人，農民，甚至一部分共產黨幹部家庭，而並不是來自被打擊的那些所謂失去了天堂，夢想復辟資本主義的「剝削階級」。爲了適應這個新的情況，中共就需要新的階級鬥爭理論解釋，並需要一套新的政策及新的鎮壓手段，以此來維持專制統治。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政權採取「一面倒」的政策，內外政策都師承蘇聯。在國際上宣布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以「美帝國主義」爲首，包括日本、西德、英國、法國的「帝國主義陣營」。指責「帝國主義陣營」支持國民黨政權，企圖顛覆和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大陸內部任何一

個反抗中共統治的言論和行動，都被歸屬於「以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復辟活動」的一部分，而被加以殘酷的鎮壓。

一九五五年波蘭發生「波茲南事件」，工人罷工反抗共產黨政府，街頭發生流血衝突。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發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的武裝起義，蘇聯紅軍的坦克輾平了布達佩斯。波匈事件給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及共產黨集團的震動很大。儘管中共政權封鎖消息，並宣傳波匈事件是由帝國主義者策劃的，但是，人們看到，在社會主義國家裏，工農群眾與被宣傳為代表工農革命利益的共產黨政權發生了流血的，對抗性的衝突。這在馬克思，列寧的階級鬥爭學說中是一個新課題。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在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作了揭發斯大林暴行的秘密報告。雖然中共政權對此報告嚴加封鎖（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見到這分報告），但人們通過各種渠道，尤其是在中共宣傳部門批判赫魯曉夫的材料中拼湊出一個印象。使人們對中共宣傳的「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牢不可破的中蘇友好同盟」，以及與毛澤東一起被讚頌的革命導師斯大林產生了懷疑及反思。

作為專制統治者，其獨裁思想絕不亞於斯大林的毛澤東，當然充分地意識到任何批判斯大林的言論及行動可能產生的政治及社會的效力。在這種背景下，中共必然注意到如何封殺知識分子，如何進一步強化專制制度和鎮壓工具。

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認為，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反抗，只應來自於「那些夢想恢復失去了天堂」的剝削階級分子。但在中國大陸，中共政權在短短的六、七年時間裏，就消滅了剝削階級，

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然而，新的不滿與反抗卻如雨後春筍一般。這種現實促使中共及毛澤東為維持專制統治，尋找新的理論和新的統治手段。

一九五七年之所以成爲中共政治發展史上的分水嶺，皆因爲中共專制政權鎮壓的主要對象已由過去的國民黨政權，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轉向爲廣大的人民群眾。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及頒布「勞動教養政策」，是這個歷史性變化的兩個重要標誌。

二、勞動教養的理論根據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公開發表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關於階級鬥爭，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論述，是勞動教養的理論依據。

毛澤東在該文中說：「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餘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⑩。毛澤東又說：「在我們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⑪。「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亦不同」^⑫。毛澤東接著說：「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⑬。毛澤東的結論是：在剝削階級被剝奪了生產資料後，在經濟上，政治上，甚至個人肉體上被消滅了以後，在

社會主義社會裡還會繼續存在著沒有了階級的階級鬥爭。任何社會勢力，任何個人都有可能被共產黨統治集團（有時是毛澤東個人）劃定為反社會主義的，人民的敵人，成為敵我矛盾而予以鎮壓。

接著，毛澤東在論述如何處置「敵我矛盾及專政」時說：「對於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¹⁴。毛又強調：「在一般情況下，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但是如果處理得不適當或者失去警覺，麻痹大意，也可能導致對抗性」¹⁵。這表明所謂敵我及人民內部矛盾的轉化，取決於中共統治集團的利益和地位的需要和變化。

毛澤東的言論預示了中共統治集團與人民群眾的矛盾已擺到具體日程上來了。因而，需要有了新的，更有效的，更簡捷的，更隱蔽的專政手段——即一九五七年實施的勞動教養政策。

三、實施勞動教養的政治背景

一九五五年八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中提出：「肅反運動中被整肅的人採取兩種處置辦法。一種予以逮捕判刑，勞動改造。另一種予以勞動教養」¹⁶。「肅反運動」整肅了約五十萬人，這些人在被各單位的中共黨組織清查出來後，被公安機關逮捕。在看守所中，約六十%的人被通知判刑，或槍決，或送勞改隊。還有四十%的人，既沒有起訴判刑，但亦未釋放，實施了沒有「勞動教養」名稱的勞動教養。接著，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各省，市應立即籌辦勞動教養機構的指示」¹⁷。（注意：這是中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通過「勞動教養條例」，八月三日國務院公布之前。這一事實也反映了中共政

權根本不存在人權和法律概念）全國各地公安機關迅速在許多勞動改造管教生產隊中，掛牌設置勞動教養大隊及收容所。勞動教養犯人完全同判刑勞改犯人控制在各勞改隊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批勞動教養犯中，基本上是被稱爲「反革命分子」的政治犯。這批人數約在二十萬人左右。他們是在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中整肅出來的「既不夠判刑又不能留用的人」¹⁸。顯然，並不是勞動教養條例中所指的無業游民或輕微犯罪分子。

一九五七年五月開始反右派鬥爭，至一九五八年二月開始處置五十五萬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及四十餘萬名因同情右派，包庇右派或喪失立場及思想反動的人，即總計多達一百萬名知識分子。毛澤東宣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¹⁹。當時身爲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說：「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中央「反右辦公室」主任鄧小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政法委員會主任彭真，共同擬定了處置一百萬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及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懲治方案。

遭到迫害的一百萬名知識分子是中共一九四九年掌握大陸政權以來，第一批來自「人民內部」，而與國民黨政權無關的人。他們是在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下，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鼓勵下，關心國事，表達了不同的政治見解。其中，還有一些人僅僅是因爲不滿毛澤東及中共的反右鬥爭，對一些右派分子個人表示同情而已，還有一些人來自共產黨內部，例如，至今流亡西方的作家劉賓雁、林希翔及前文化部長的王蒙（一

九八六一一九八九），及在大陸各地爲共產黨游說宣教的曲嘯等。

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三月，鄧小平還宣稱：「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之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²⁰

中共的懲治方案決定：右派分子屬於：「敵我性質的矛盾」，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以行政處分方式，共劃爲五級進行懲罰²¹。右派分子中菁英的部分——「極右分子」悉數被逮捕送勞動教養，投進勞改隊。自一九五八年後，又陸續不斷地將其中相當一部分右派分子以「抗拒改造」，「頑固不化」等等罪名，加以逮捕勞動教養或判刑勞改，投進勞改隊。

由此可見，勞動教養政策的功能，首先在於處置不同政治見解及不滿反抗者。在處置「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方面，勞動教養充分有效地發揮了它的作用。即避免了對幾十萬人的繁瑣的法律訴訟程序，以及政治及人權方面的激烈反應，又十分有效地將持異見者，對專制統治不利的人整肅了。

同樣，實施勞教如同勞動改造一樣，對於中共政權除了具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而且還具有其重要的經濟原因。